

资产阶级自由化 主要论点评析

中共浙江省委宣传部理论处主编



资产阶级自由化主要论点评析

中共浙江省委宣传部理论处编

浙江人民出版社

资产阶级自由化主要论点评析

中共浙江省委宣传部理论处编

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杭州武林路136号)

浙江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5.25 字数110 000 印数1—35000

1987年4月第1版 1987年4月第1次印刷

ISBN 7-213-00034-9/D·12

统一书号：3103·270 定 价：0.82 元

目 录

前言 (1)

关于社会主义道路

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具有坚实的理论基础 (9)

社会主义决不是空洞无物的幻想 (12)

我国三十年社会主义建设是失败的吗? (14)

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发展不容否定 (17)

社会主义的科技事业不能以引进资本主义

思想作基础 (20)

宣扬“补资本主义的课”就是开历史倒车

..... (23)

“全盘西化”在中国行不通 (27)

不搞两极分化决不是“恐资病” (30)

中国现实社会的一切东西都是封建主义的

吗? (33)

西方世界是一个“全面发达的社会”吗? (36)

资本主义出现的矛盾能自行通过正常秩序

调整解决吗? (39)

我国的社会环境能够充分发挥知识分子的

聪明才智 (43)

决不容许用严重颠倒是非的手段来破坏安

定团结 (47)

关于人民民主专政

社会主义时期必须坚持人民民主专政 (50)

这是哪一家的民主观? (53)

肯定资产阶级自由、平等观念的历史进步

作用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并不矛盾 (57)

民主化不一定要“三权分立” (61)

民主精神并不是高于一切的 (64)

“发扬民主”的观念没有错 (67)

民主化就是矛头对上吗? (70)

今天的中国还没有解决人们的基本权利问

题吗? (73)

解放以后的自由是扩大了，还是缩小了? (77)

我国的政治是透明的 (81)

我国人民代表的选举是封建主义的吗? (84)

打击经济罪犯决不是打击改革家 (88)

禁止演坏戏是压制“创作自由”、“看戏自

由”吗? (91)

评所谓中国人经常生活在恐惧环境里 (94)

鼓吹“谁也不怕谁”就是目无法纪 (97)

该不该为资产阶级自由化而斗争? (100)

关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中国共产党是完全可以信赖的 (103)

在我国决不能实行西方式的多党制或轮流

执政	(106)
在中国共产党内决不能搞多派制	(110)
踢开党委闹革命的历史悲剧决不能重演	(113)
决不允许改变我们党的指导思想和性质	(115)
党报是党的喉舌也是人民的喉舌	(119)
不许挑拨党同知识分子的关系	(122)
鼓吹知识分子要有“独立的地位”是妄图 摆脱党的领导	(125)
我国有新的官僚资产阶级吗?	(128)
雷锋的“螺丝钉观”是“工具论”最典型 的体现吗?	(130)

关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是正确的	(134)
马克思主义是狭隘的吗?	(137)
科学研究应当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	(139)
“百家争鸣”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144)
马克思主义指导就是当权者的指导吗?	(147)
社会主义大学就是应当以马克思主义为指 导思想	(150)
“正统的框框”不能解脱	(153)
思想文化战线拨乱反正的历史功绩不容抹 煞	(155)
反对精神污染是必要的	(158)

编后说明

前　　言

当前，我们在政治思想领域的第一位任务，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开展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资产阶级自由化是一种怀疑和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政治思潮，其实质是否定社会主义制度，主张资本主义制度，核心是反对中国共产党对于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在中国已经走上社会主义道路30多年后的今天，鼓吹这样的主张，不管其动机如何，客观上只能被认为是开历史的倒车。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一贯方针。早在1979年3月，邓小平同志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针对当时社会上有人借反“左”之机散布自由化言论，而党内也有个别人同情和支持这种言论的情况，严正申明：中央认为，我们要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无产阶级专政、共产党的领导、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四项基本原则；我们必须一方面继续坚定地肃清“四人帮”的流毒，批判极左思

潮，另一方面用巨大的努力同怀疑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潮作坚决的斗争，因为这两种思潮都是违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都是妨碍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前进的。1981年，由于一度有所收敛的自由化倾向重新抬头，特别是文艺领域，出现了以《苦恋》为代表的丑化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作品，以及一些文艺界同志到处发表演讲，散布自由化观点，邓小平同志同解放军总政领导同志谈话中严肃指出，反对和否定四项基本原则有来自“左”的，有来自右的，因此要批判“左”的错误思想，也要批判右的错误思想。他还在同中央宣传部门领导同志的谈话中，批判文艺界的一些人思想路线不对头，同党唱反调，作风不正派，想要脱离社会主义的轨道，脱离党的领导，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并且指出，主要问题不在于有这些现象，而在于我们对待这些现象处置无力，存在着涣散软弱的状态。不久，中央专门为此召开了思想战线问题座谈会，提出了克服涣散软弱状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任务。1983年，由于思想界的自由化倾向依然如故，不论是文艺界，还是理论界、新闻界，都有人公然散布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腐朽没落的思想，散布对于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的不信任情绪，邓小平同志在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上，指出领导上的软弱涣散状态仍然存在，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有的有所克服，有的没有克服，有的发展得更严重了，因此严肃地提出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1985年，鉴于有些人借口反对精神污染的斗争在最初一段时间里做法上出了一点偏差，根本否定这一斗争的必要性，并以反“左”为名，继续鼓吹背离四项基本原则的言论，造成了自由化思潮在全国思想文化界的

泛滥，中央常委特别是邓小平同志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又一次强调必须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严正指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宣传，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宣传。由于中央再三申明必须反对自由化，这一思潮再度有所收敛。但在1986年，搞自由化的人重新活跃起来，借着我们准备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机会，发表其错误的政治主张，并且直接发展到煽动学生闹事，终于导致了冬季波及全国十几个城市的学潮，严重干扰改革开放，妨碍安定团结，迫使我们党不得不领导开展当前这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

有些同志把这次中央提出开展反对自由化的斗争，看成一件新鲜事，甚至感到突然，并且怀疑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是不是变了。但是，只要回顾和重温一下8年来的历史，就可以说明这种看法和疑虑是完全没有根据的。因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就是从实际出发，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首先是社会主义，其次是中国特色。由此决定它必然具有两个基本点：一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一是坚持改革开放搞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才能保证改革开放搞活的正确的政治方向；坚持改革开放搞活，才能在新的形势下丰富发展四项基本原则的内容，更好地体现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所以这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是全面贯彻执行三中全会路线的必然要求和必要步骤。它同改革开放搞活，是完全一致的，是为了从根本上保证改革开放搞活沿着正确的轨道健康地发展下去。

由此可以看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同资产阶级自由化已经进行过多次斗争，其中比较大的就有五次。每经过一次斗争，自由化都有所收敛。但是过了不久，又重新发展起来，甚至达到泛滥的地步。那么，自由化倾向如此难以克服，原因在哪里呢？

任何一种政治思潮，都是一定社会历史条件的产物。粉碎“四人帮”以后，资产阶级自由化在我国的滋长、蔓延，并形成为一股社会思潮，日益泛滥起来，也是有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的。首先，它与“文化大革命”的灾难分不开。因为在十年内乱中，林彪、“四人帮”搞封建法西斯专政，搞文化专制主义，思想界首当其冲，成为重灾区。粉碎了“四人帮”，人们完全有理由对过去那种极左的做法进行彻底的清算。但是也有一些人，不是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而是以某种个人的偏激情绪，去从事这一斗争，结果反“左”反到四项基本原则头上，走到了右的极端。同时，十年内乱中的那种极端的做法，“大民主”的方式，无政府主义的思想，在党内外有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这种影响迄今仍在一部分人中发生着作用。所以，自由化的泛滥，可以说是对“文化大革命”的一种反动，是十年内乱的后遗症。其次，一定范围内的阶级斗争，尤其是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存在，不会不反映到政治思想领域中来；随着对外开放的扩大，外来资本主义思想的腐蚀也是不可避免的。再次，几十年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受的种种挫折和我们党过去发生的种种失误，也的确损害了党和社会主义的形象以及马克思主义的威信，导

致党内一些不坚定分子对四项基本原则发生怀疑和动摇。

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滋长、蔓延、泛滥，还有主观方面的原因。第一，我国的思想界，主要是党内的一些同志，在若干重大问题上，历来流行着一些很错误的观点。例如在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上，认为1956年的社会主义改造缺乏必要的物质前提，随后建立起来的社会不是科学意义上的社会主义社会，并用党的现行政策去反证这一改造是“主观愿望的产物”。在党的领导的问题上，不能正确分析党犯错误的复杂的主客观原因，往往以党犯过错误为理由否定党的领导。在解放思想的问题上，不是把解放思想看成实事求是，而是把它看成仅仅是为了反“左”批“左”，甚至把它理解为可以脱离实际、脱离任何原则的胡思乱想。在双百方针的问题上，不认为它是坚定的无产阶级的方针，马克思主义的方针，而是把它看作鼓励不受任何约束的放和鸣的自由化方针。在创作自由的问题上，也存在着形而上学的理解，似乎强调允许创作自由，作家就可以忘记自己肩负的社会责任，离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大局，去随心所欲地创作和发表作品，不承认世界上没有什么绝对的、无条件的、抽象的创作自由，不承认创作自由本身并非目的，而只是表现人民意愿和传达时代呼声的一个必要条件，不承认社会主义文艺应当体现创作自由与无产阶级党性原则的高度统一。如此等等。第二，我们党的组织在思想领导方面，确实存在一些严重的弱点，主要是几年来思想政治工作薄弱，一些同志对错误的尤其是右的倾向不敢批评，反对自由化旗帜不鲜明，态度不坚决，涣散软弱状态始终未见克服。所以如此，是因为在彻底批判和废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做法以后，对一定

范围内的阶级斗争及其在政治思想领域的反映，有所忽略，解决的措施不力；在党内反倾向问题上离开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只注意批评“左”的倾向，不注意批评右的倾向，而且在右的倾向已经日益显露的情况下，还是只反“左”不反右。这就在客观上使自由化鼓吹者的胃口愈来愈大，自由化要求的水平愈来愈高，乃至发展到直接要求取消四项基本原则，全盘西化，实行资本主义的经济政治制度。

可见，自由化思潮的滋长、蔓延、泛滥，不是偶然的现象，而是各种主客观因素共同起作用的必然结果。有些同志对自由化思潮的泛滥感到突然，也有些同志认为反对自由化不过是一阵风，刮过去也就完了。但是，只要弄清了自由化的根源，就不会对它的泛滥感到不可理解，而且还能从中得出与自由化作斗争是一个长期任务的结论。因为上述种种原因中，有一些是不可能很快消除的，这就使自由化思潮有着一定的气候和土壤，如果党组织在思想领导上软弱退让，那末它就会泛滥起来，即使在经济政治形势很好的时期，如象这几年的情况那样，它的泛滥也是不可避免的。

三

我们同资产阶级自由化鼓吹者的分歧，不是一般的认识问题和学术思想问题的分歧，而是要不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大是大非问题的分歧。由此决定了反对自由化，不能不是政治思想领域的一场严肃的斗争。这场斗争，关系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能否正确地坚持下去，关系到我们的事业将由什么样的一代人来继承，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命运以及社会主义事业的前途，因此具有十分深

远的意义。

可是，有些同志并不这么看。他们认为资产阶级自由化，不过表现为极少数人的错误言论，为此而开展一场斗争，未免小题大作。其实，尽管几年来我们的思想战线的工作是很有成绩的，也尽管我们党的大多数思想理论工作者和文艺工作者是严肃认真地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搞自由化的人是极少数，但是自由化的影响很大，流毒甚广，不可等闲视之。邓小平同志早就说过，精神污染的危害很大，足以祸国害民。自由化也就是精神污染，而且是精神污染的核心和实质。搞自由化的人在人民中混淆是非界限，造成消极涣散、离心离德的情绪，腐蚀人们的灵魂和意志，助长形形色色的个人主义思想的泛滥，助长一部分人当中怀疑以至否定社会主义和党的领导的思潮。几年来，由于自由化思潮的畅行无阻，的确把很多人的思想搞乱了，使一些不清醒的革命者和涉世未深的青年人迷失了方向。我们固然不能过高估计一种不良思潮对社会的腐蚀作用，但如果过低估计这种作用，将会犯历史性的错误。我们必须意识到，一种错误的倾向和思潮，对社会的危害并不是自然科学实验室里的几十次乃至几百次的失败所能比较的。后者造成的损失毕竟有限，而前者带来的影响，却可能在很长一个时间内难以挽回。一种错误的倾向和思潮，对社会的危害也不是经济工作和其他工作中的一般性失误所能比较的。后者通常不会影响到我们政治制度的性质和方向，而前者则往往涉及一系列根本政治原则和政治方向问题。资产阶级自由化作为一种已经发生广泛影响的社会思潮，不同于个别性质、枝节性质的错误，如果再不加以批评控制，任其泛滥下去，就可能象某种传染病

一样，危害整个社会的精神健康和安定团结，甚至导致象“文化大革命”那样的灾难。这决不是危言耸听，无病呻吟。

因此，我们广大共产党员，要积极参加这场斗争，并且站在斗争的前列。尤其是党的思想理论工作者，马克思主义者，应当出来讲话，遵循科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运用新的丰富的实际材料，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主要论点进行充分说理的、有说服力的分析批评，帮助人们在许多根本政治原则和政治方向问题上划清是非界限，团结绝大多数，同心同德地为全面、正确理解和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奋斗。当然，要进行这样的分析批评，不是没有难度的，而且由于自由化的观点和言论有其许多特点，例如通常打着“关心改革”、“为民请命”的旗号，涂着“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油彩，装着“反‘左’”的姿态，披着“新理论、新观念”的外衣，这就往往似是而非，不易识别。党的思想理论工作者的任务，就是要用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透过现象揭示其本质，从根本上指出其错误。省委宣传部理论处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和责任感，在部委的领导下，组织各方面的理论工作者，撰写了《资产阶级自由化主要论点评析》一书。尽管由于水平和时间的限制，这本书还很不成熟，理论深度不够，运用的材料也尚欠丰富，但是，我们可以把它作为一个起点，在这个基础上再接再厉，推进新形势下充分论证四项基本原则这一崇高的创造性的科学工作。

1987年3月2日

关于社会主义道路

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具有坚实的理论基础

方励之1985年11月4日在北京大学的讲话中说：“实际上到现在我们也没有任何正统的或非正统的理论来说明我们将来到底是什么。原来我们说‘社会主义’，现在说‘中国式的社会主义’。什么是‘中国式的社会主义’，也只有名词。”这种毫无根据的断言，只能说明他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无知。

马克思、恩格斯早在一个多世纪以前，就已根据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进程，预见到未来社会的基本特征，包括在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基础上由社会占有全部生产资料，根据社会全体成员的需要按照确定的计划进行生产，从而消灭阶级和一切阶级差别，并使商品货币关系消亡，由按劳分配过渡到按需分配，全体社会成员的道德水平和文化水平极大提高，三大差别消失，人们自觉地按客观规律办事，自觉调整相互关系以及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国家消亡，每个社会成员都能够完全自由地发展和发挥他的全

部力量和才能、等等。这些基本特征有着内在的必然联系，形成了系统的理论，为无产阶级指明了奋斗的目标。这一科学理论已经鼓舞了并正在鼓舞着千百万劳动者前进。

各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后，都把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所预示的未来社会基本特征，作为建设新社会的方向。尽管由于种种主客观原因，各国的社会主义实践不同程度地出现过一些失误，但上述基本特征所揭示的社会发展方向，已被实践充分证明是正确的。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国民经济，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和科学文化教育事业，提高人民群众的思想道德水平和文化水平，缩小三大差别等，都已成为社会主义各国不可动摇的指导原则。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一直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把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并在斗争实践中逐步认识到必须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从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开始，我们党就在探索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虽然由于社会历史条件的限制，许多党员对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解有不科学的地方，以致犯了“左”的或右的错误，甚至让林彪、江青一伙的假社会主义得逞于一时，但正是由于党的绝大多数党员和领导骨干是忠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一奋斗目标的，所以我们能从社会主义事业遭受的挫折中正确总结经验教训，以科学的态度对待科学社会主义，实现了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根据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明确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个科学命题，并把它作为党的路线的核心内容。这决不意味着放弃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提出的基本目标，

而是确定了在中国的具体条件下走向这一目标的正确道路，规定了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要完成和能够完成的主要任务。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决不是象方励之所认为的那样“只有名词”。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深刻总结了我们党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把适合我国情况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道路概括为十个主要点。党的十二大提出了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的任务，规定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各个主要方面的基本方针政策和近期目标。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勾画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基本轮廓。《中共中央关于科技体制改革的决定》和《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又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两个重要领域中，规定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基本任务和方针政策。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又进一步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布局作了科学的概括，提出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定不移地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地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并且使这几个方面互相配合，互相促进。”这个决议还明确规定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基本指导方针、根本任务以及在精神文明建设的几个主要方面的基本要求和方针政策。决议所提出的精神文明建设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必须促进全面改革和实行对外开放的指导原则，体现了我们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路线的两个基本点。近一年来，邓小平同志又明确